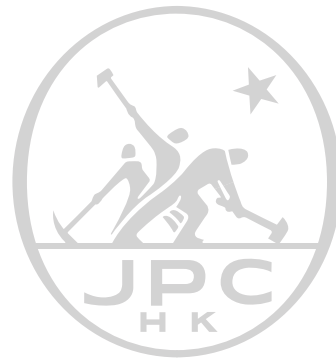


反思中國女性主義

已有學者指出，在中國這樣的後發現代性國家語境中，“女性主義”需要處理的現實/理論顯然是相當複雜的：西方/中國，男性/女性，中產階級/無產階級，普遍性/特殊性，白人中心主義/後殖民理論……^[1]甚至提出，當“中國”、“本土”、“民族”這些具體的語境要件被排除出去之後，“父權/夫權”文化除了作為空洞的概念/話語所指，到底還剩下什麼？^[2]這一提問突出了空間背景於中國女性主義的重要性。離開與西方的空間對比，抽離對話語境，很難討論中國女性主義。

普遍的觀點和事實是，中國女性主義並沒有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數千年“在家庭——半國家機器與父子相繼的權力結構上確立起來的父系統治秩序，造就了與之完全相應的意識形態體系。這一體系以自身的嚴明和自圓其說，將統治秩序的真正起因和真實本質遮掩得天衣無縫，從而使秩序的存在看上去天經地義。”^[3]前現代男人的體力優勢和農業文明的家庭倫理，使女性組織起來進行社會運動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相反，西方女權運動是對現代性的反思，是現代的產物，她們在工業革命帶來的時代機遇中，發動了目標明確的女權運動，她們向男權社會明確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如針對選舉權、教育權、就業權等等指標，要求男女平等，她們展開社會運動的條件是她們已隨著工業革命走出了體力和家庭倫理空間。她們要爭取更大的平台，以及在更大平台上創造的權力。

作為空間對比性存在的東方，傳統“父權/夫權”文化在“中國”受到西方強勢現代性衝擊之際，顯現為“落後”存在，身處於“父權/夫權”統治之下的



中國女性，同樣淪為“落後”風景。此時讓中國女性組織起來的力量，只可能是向西方現代性學習的“先進”男性。他們需要號召和培養與他們一樣向西方學習的中國女性，以改變中國的“落後”現狀。歷史事實正是如此，近代中國女性的兩大社會運動即放足運動和女子教育運動，發動主體都是“先進”的男性知識分子。^[1]而他們也必然把民族國家危亡處境讓女性共同分擔，誠如著名的《女界鐘》所說：“十九世紀之中國，一落千丈於世界競爭之盤渦；若二十世紀之中國，則一躍千丈於世界競爭之舞台，此理勢之必然也。男子然，女子亦何獨不然？”^[2]因此，受西方第一波女權運動影響的中國最早的女權主義者們，並沒有也不可能和西方女權主義者一樣，直接有針對性地提出女權社會運動理論和方案。她們面對中國社會現實，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如秋瑾所寫《勉女權歌》：“願奮然自拔，一洗從前羞恥垢。若安作同儔，恢復江山勞素手。”^[3]提出希望女性覺悟，同時引用西方人物為參照，更把女性的解放和民族國家解放相提並論。秋瑾和她的《勉女權歌》見證了所處時代的中國現代性處境和女性處境的同構。

在西方的強勢壓力之下，“中國”必須使“女性”和“男性”都成為“現代民族國家”主體，中國需要培養“新青年”、“新女性”。倡導女性解放，讓現代性生長，這一“本土”、“中國”真實的需要，對於中國女性和男性幾乎同樣迫切。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性別之間的衝突，反而降為次要矛盾。相反，一種新的平等的家庭倫理倡導，成為“先進”時尚，這可以從冰心的社會問題小說《兩個家庭》文本中印證。^[4]小說開篇提出“家庭與國家關係”講座，然後講述了兩對年輕夫妻的生活，將平等互助的夫婦關係寫得溫馨美好，充滿創造性，意旨家庭新式國家才會先進。把舊式女子把持的家庭寫成一團頹敗，最後丈夫抑鬱而死。可見，女性主體與國家主體同一性想像，從秋瑾到冰心並無二致，雖然秋瑾是激進的革命者而冰心是溫和的作家，作為女性的性別想像，她們都沒有從民族

1 董麗敏：《性別、語境與書寫的政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1 頁。
2 同上書，第 55 頁。
3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 頁。

1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1、92、129、130 頁。
2 金天翮：《女界鐘》，陳雁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 頁。
3 秋瑾：《勉女權歌》，郭延禮選注：《秋瑾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6 頁。
4 冰心：《冰心選集》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1 頁。原刊《晨報》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八至二十二日。

國家想像中脫離出來，反而可說是形成了一種通行的傳統。而不可忽略的是，脫離這一國家想像傳統制約的女作家，如蕭紅和張愛玲，她們對傳統父權和現代父權表達了雙重絕望，探索獨立女性的前景卻受制於雙重壓抑而無法看到光明。這可以解釋她們作品的絕望格調與日常生活寄託，她們的獨立思考具有書寫主體價值，卻不能在現實路徑中展開。值得欣慰的是，以上不同女性寫作傳統的開闢，將在大中華語境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發展中獲得多元的拓展，共同體現對父權現代性危機的反思和批判。

女性與家國想像一體化的傳統，在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得到強化，並成為國家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構成。“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國家倡導並實施了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以保證男女共同參與現代性發展，一起建設社會主義事業。這一“國家女權主義”，^[1] 形成與西方女權運動迥然不同的中國特色婦女解放。也可以說，群體上，中國婦女獲得了被解放；個體上，她們需要理解和珍惜解放的意義。社會空間面向女性完全打開，她們可以自由飛翔，天空是藍色的，陽光是燦爛的，但飛翔的願望和計劃，依據自身條件和歷史條件，卻是並不相同。

事實上，“中國”對於現代性的迫切需要，使中國婦女地位被重新定義：在歷史無意識提升到歷史地表的使命中，她們是民族繁衍的載體，是勞動價值的源泉、革命的榜樣、市場的消費者，也是忍耐的工人。^[2] 百年歷史演變，疾速繁複的現代性推進，使得中國女性既目不暇接，又負擔深重。一方面她們看起來是最解放的，與中國男性比肩；另一方面，她們是實實在在最辛勞的。因為她們同時肩負著家和國振興的使命。現實中法律上，國家給予的解放成果已超出西方女權努力爭取的結果，這就使得中國缺乏像西方女權運動一樣的現實女權運動土壤。生活中精神上，她們所遭遇的困境在於：現代性競爭帶來的晦暗不明的壓迫，傳統



與現代角色衝突帶來的緊張焦慮的生存，與全民一起奔赴現代化的明確大目標和個體女性自我解放並不明確的目標之間的迷茫。

根據劉禾、瑞貝卡·卡爾和高彥頤等學者的研究，20 世紀初誕生的中國女權思想家何殷震，與當時重要的男性思想家梁啟超、金天翮一樣，對晚清遭遇的後發現代性處境有深刻反思，倡導女性解放，但她超越於同時代男性思想家之處，則是對西方父權現代性征服力量有敏銳的批判視野，她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父權與傳統父權一樣，都有一種剝奪女性資源的生產機制，使得性別生計作為不平等的政治經濟學，構成人類不平等的過去與現在。既看到西方父權的征服性，又對傳統父權統治有清醒認識，並因此而對新男性新女性的現代性成長抱有反思精神，何殷震甚至批判了當時新男性倡導女性解放，認為他們是出於現代性競爭的需要而並非真正為了女性解放。何殷震的女權思想穿越時空，為全球女權理論貢獻了智慧，其反思的力度，有助我們理解文學的女性主義發生，中國女性在現代性遭遇中難以言表的複雜處境，需要深入心靈的文學進行經驗的記錄、思想的清理、想像的釋放。她們需要豐富的話語表達，用話語權來呈現自己真實的處境、真實的需求，及面向現代性真實的探索力度。

按照凱特·米利特 (Kate Millett) 《性政治》觀點，文學寫作中充滿性別權力支配關係，^[1] 在本書的文本分析部分，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女性的文學寫作，呈現了非常複雜的支配關係，一重是西方現代性施加於中國的強制支配關係，一重是這種支配關係通過影響中國男性再施加於中國女性的變形支配關係。中國女性的文學書寫，不期然之中成為一種最獨特的反抗方式，一方面見證西方父權的侵入力，另一方面見證中國傳統父權受創、現代父權新生，女性主體艱難和策略地成長進程。文學文本也同時成為反觀中國女性遭遇極度複雜性別支配關係的場域。西方父權的侵入力、西方女權思想，都通過中國不得不接受的現代化形式，行使對於中國女性的塑造。因此，中國的女性主義思潮，是一種尋找和建構女性主體的反思現代性思潮，它反思的對象是複合存在的，來自西方的現代父權、受到壓

1 Zheng, W: "State Feminism" ?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 (2005) 519-551. 荒林：《中美比較：女權主義的現狀與未來——密歇根大學王政教授訪談（上）》，《文藝研究》2008 年第 8 期。

2 (美) 湯尼·白露：《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沈齊譯，李小江審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64 頁。

1 (美) 米利特 (Kate Millett)：《性政治》，宋文偉、張慧芝譯，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版，前言第 1 頁。

抑變形的中國傳統父權、新生的中國現代父權，還有西方女權的影響力量。面對如此龐大集合的複雜權力場域，文學的女性主義體現了獨特的政治智慧，發出自己多聲部的聲音，堪值深入總結提煉和傳播。

中國的女性主義從發生之日，即是複雜現代性的一部分。首先，“五四”新女性即是民族國家追求現代性的產物。用梁啟超的話說，“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為了國家強盛需要培養有現代知識的新女性。^[1] 中國的女性解放，就是由接受了西方現代理念的進步男性所倡導，他們為了民族國家的進步需要，倡導女性放足，倡導女性接受西方教育，也鼓勵女性寫作，表達與舊的生活傳統決裂，構想新的現代生活圖景。其次，中國的女性主義理念來自西方，本身是作為西方的原發現代性植入中國，引發了中國現實生活中的後發現代性，促使了新女性們的成長，新女性的成長與舊式傳統女性之間完全斷裂，轉而以西方現代女性為參照，實際上是現代性的需要。第三，女性主義作為現代性指標，演變為現代民族國家與西方現代性競爭的指標之一，長期以來，新中國的男女平等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用以證明現代性追求和實現的水平，國家女權主義成為時代的驕傲。^[2]

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女性主義首次受到了本土新生現代父權力量的強大衝擊，本土新生父權借力中國傳統父權意識，也借力西方現代父權競爭意識，對中國女性展開強勢排斥，多次要求婦女返回家庭，^[3] 並在城市化進程中把女性視為都市的欲望消費對象。^[4] 這些造成婦女地位明顯下降。所幸聯合國推動全球婦女參與現代性的努力推展到中國，而中國國家行為的迎接 1995 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帶來了西方女性主義的最新成果，使得女性主義本土資源與外來資源匯合，產生了應對市場的女性主義力量，如非政府組織、婦女團體、女性



學科，及對於女性寫作的出版支持。這一切使得中國的女性主義開始自我成長之旅，面對新生現代父權、傳統父權復甦及西方現代父權擴張，中國的女性主義急需多元的政治策略。文學的女性主義事實上起到了與國家女權主義互補助力的作用，進一步而言，文學的女性主義主體不是國家力量，在實質上，就構成了女性自我解放的真正主力。這種情形，可以用經濟上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來做一個類比，中國的改革開放，民營企業的活力與貢獻人所皆知，在促進中國女性精神解放與創意思想發展上，文學的女性主義奉獻了有史以來最豐盛的成果，體現了中國崛起追求平等對話的現代文明成就。

中國的女性主義寫作事實上成為女權運動的主要形式。^[1] 這可說是歷史的選擇。一方面新老父權與西方父權複合博弈的父權力量過於複雜和糾纏，另一方面國家女權主義造就了知識女性群體，反思現代性的任務多樣而繁重，中國女性主義也需要自我成長的空間。自我成長則又是現代性的題中之議。通過寫作探索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物的關係，人與自我的關係，建立女性主體，這一現代指向的女權政治，或者稱女性主體政治更加準確。它意味著中國女性主義可以直接借鑒西方女權運動成果，更容易接受後現代女性主義策略，並豐富和發展，形成自己的主體政治策略。這無疑已從大中華語境繁榮豐盛的女性寫作現象中呈現出來。湧動呼應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見證多元主體政治建構的風景，也體現了對於百餘年複雜現代性經驗的深刻反思。

“五四”新女性中湧現的女作家群，主要敘寫了自己成為新女性的故事，換句話說，就是書寫如何獲取現代性，取得自我成長的故事。正如王富仁所說，“中國早期的女性文學實際上只是女學生的文學”。張莉在《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中，用詳細史料梳理了女學生的培養和女性寫作的發生，這是一個實際上向西方教育取經，獲取現代性的成長過程，在此過程，新男性不僅是支持者，實際上是類似“兄妹關係”的共同成長者，為了新的現代經驗，他們是合作者、協作者，和生產新自我的“西方的學生”。儘管沒有

1 王美秀：《全球化對中國知識女性的影響》，葉漢明編：《全球化與性別：全球經濟重組對中國和東南亞女性的意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1 年版，第 102 頁。

2 戴錦華：《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頁。

3 王美秀：《全球化對中國知識女性的影響》，葉漢明編：《全球化與性別：全球經濟重組對中國和東南亞女性的意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2011 年版，第 108 頁。

4 黎慧：《欲望·代碼·昇華》，《上海文論》1992 年第 2 期。

1 李小江：《新時期婦女運動與婦女研究》，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性別與中國·平等與發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7 年版，第 347 頁。

人提出“五四”新文學總體上也都經歷了學生文學這一階段，但既然“女學生的文學”提出來獲得了認可，順理成章，學生文學階段是普遍存在過，正如魯迅《傷逝》中，子君和涓生，實際上就是兩個沒有經驗、沒有經濟來源、找不到工作，唯有學生式的愛情而最終也消亡了這份脆弱的學生之愛的故事一樣，我們是從回溯中看到現代性植入的“學生”、“學習”困難。

但是，當女學生培養成功，女作家群成長起來，樹已成林，社會空間也向女性敞開，卻面臨和遭遇現代性的多種壓抑和磨難，她們就不再是單純的女學生，而必須是成熟的現代女人，此時此際，她們自然也需要尋找自己原來的母親，那被完全遺忘的傳統的母親，難道真的沒有生命經驗可以借鑒？母親們生存的苦難和力量，是不是另一個源泉？如果外來的優秀女性是她們成長的參照，在與中國語境相結合時，她們應該如何定位自己？這就不難發現，冰心更多從母親傳統那裏吸收了滋養，張愛玲和蕭紅卻選擇了不同的反思歷史與文明的成長方向，丁玲看到了革命中的活力和驅除苦悶的社會行動的力量，而更多女作家的不同努力呈現於文本蹤跡，都意味著對現代性多種面向的探索，其成長的經驗都值得反復研究。即是說，作為書寫的現代性，現代女作家們的文本見證了中國和中國女性的現代遭遇與應對。在此意義上，孟悅和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仍然是經典，採用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視角依然有效，“浮出”的艱難和見證，作為女性成長內在的精神歷程，具有開掘不盡的源泉。因為放在空間的視野，中國女性的浮出歷史地表，當然也是全球女性解放的組成部分，而且浮出之艱難，需要先“植入”再“帶出”，“浮出”的歷程必然更加複雜多樣。事實上，“浮出”者的深刻反思，已洞穿西方現代性植入的秘密，在看似言情的《傾城之戀》中，張愛玲揭示了武器擴張的硬件現代性；在《生死場》中，蕭紅揭示了戰爭與“浮出”的真相。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是世界女性、也是中國女性，從現代性血與火的暴力競爭中全面“浮出歷史地表”的標誌。年輕而敏銳的中國女學生文學迅速蛻變成現代婦女文學，這個高度的成就，成為後續中國當代女性寫作的起點，並成為文學的女性主義的源頭活水。

當代中國女性寫作不僅關注女性現代性遭遇，也深入追問男性的現代性遭遇，關注到性別民族國家與現代性關係構成的更複雜深度之處，從中呈現與西方



女性主義不同的政治主題。以大陸女作家張潔的《無字》為例，文本在書寫三代女人的苦難遭遇時，同時書寫了三代導致女人苦難的男人們的命運。他們投身戰爭、革命、改革，然而並沒有因為孜孜於這些他們認為偉大的事業而獲得應有的名分與尊嚴，男人們在現代化的巨大壓力下，徒然追隨現代性，卻終是平庸無名之輩，或者名分付諸東流，歷史迅疾演變，他們一無所有。現代性剝奪了他們彪炳史冊的願望，剝奪了時間的永恆性，使人物化為現代的渺小奴隸。書寫男性的失敗經驗和弱勢男性經驗，無疑提供了現代性批判更犀利的角度。

張潔在她的另一名篇《祖母綠》中，^[1] 講述了兩個女人愛同一個男人的故事，著筆重點是名為曾令兒的女人，她為愛情歷盡滄桑而不悔，終體驗到小愛擴展為博愛的海一般浩瀚，發現並肯定自己擁有“祖母綠”一般“無窮思愛”的能力。另一個名為盧北河的女人，則用愛情成就了婚姻，過著在別人眼中令人羨慕的生活。但這兩個女人深愛的名為左葳的男人，徒有外表，內心裏既不懂得愛情，能力上也無法給予任何一個女人幸福。就像他的名字“左葳”，他活著，他的生活需要妻子盧北河全盤規劃和打理，他的學習和事業則依賴曾令兒的奉獻和犧牲。男人左葳的生存威望，可說得力於兩位女性的“助威”。

《祖母綠》揭示出中國性別問題存在的獨特性：中國的女性，面對的是中國男性的羸弱，中國女性的成長，不是源於與強大男人的競爭，而是源於自我激勵，如曾令兒一般承擔並思悟。女人曾令兒、盧北河與男人左葳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強力對抗和競爭關係，而是一種幫助、扶持關係。這與西方女性和男性的現代關係迥然不同。西方女性，她們抗爭的對象，是強勢的西方男性。如果說西方女性主義是對西方男性擴張現代性的反思，中國女性主義則是對中國男性受壓抑現代性的反思，是女性主體自我激勵成長的張揚。在此意義上，選擇文學的女性主義行動，一方面有助女性自我成長，是女性精神建構的方式，是一種“祖母綠”式“無窮思愛”的自我肯定；另一方面則源於社會行動時機的不成熟，女性主義不可能與尚不成熟的男性力量展開較勁，把時間和精力浪費在無用功上。事實上，《祖母綠》還隱藏著另一個更深刻的中國式的現代性故事。這就是三個同

1 張潔：《祖母綠》，《花城》1984年第3期。

班同學的故事，兩個女生，一個男生，他們在現代競爭中的成長故事。幾十年之後，這三個同學在同一個集體相遇，這個集體的名稱非常前衛：計算機微碼編制組。此時，人格成長成熟、專業技術一流的曾令兒，成為了支撐計算機微碼編制組的頂樑柱，盧北河則是這個組的人事協調員，名為組長的左葳，雖然形同虛設，兩個女人卻全心支持他的工作。人到中年，他們也都拋開愛情恩怨，意識到集體存在的重要性。實力和名分的差異，大家雖了然於心，仍然把合作放在首位，要一起贏得集體和國家的發展。這正是中國現實社會的文學寫照。

一種中國式的現代性，建立於與西方強力競爭關係場，從而使性別問題與民族國家問題纏繞不盡，難捨難分。對此進行深刻反思的中國女性主義，更因承擔複雜的議題，需要用文學行動進行持續深刻的支持。

因此，重新評估中國所遭遇的西方現代性壓力，考察後發現代性如何作用於女性和男性，是理解大中華語境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生成及價值目標的前提，也是評價中國女性主義思想貢獻的必須。中國女性主義的經驗，可以說不僅與西方白人婦女不同，也與黑人婦女沒有太多共同之處。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約略看到一幅複雜的中國女性主義地圖：由進步男性領導的解放婦女運動，包括放足運動和女性教育運動，到國家女權主義即國家倡導的男女平等，再到文學的女性主義，即女性主義寫作實踐促成女性自我解放。這一切皆以中國現代性遭遇為表裏。對文學的女性主義探源，首先當是女性教育運動催生了知識女性，知識女性受西方女性主義啟發，不斷反思自身現代性處境而成長，現代婦女作家群留下的大量文本，是當代女性寫作的出發地。當代女作家群的出現，受惠於國家女權主義創造的知識女性群體，男女平等國策，為知識女性群體積累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提供條件，而中國改革開放創造的廣闊文化市場，更是促使女性寫作繁榮的文化經濟推動力。國家迎接“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到北京，使世界女性主義資源為我所用，與世界女性主義展開對話，則促動反思成長和思想成熟。文學的女性主義綜合各長，以文學行動創造文化資本，將女性的創意思想貢獻於人類文明，如同科技創新改變生產力，思想創意改變人們的觀念，文學女性主義見證女性主體多元成長的力量，探索男女平等對話、國族地區平等對話、不同文明平等對話的諸種路徑，展現了改



革開放中國的現代文明造血能力。

“對於文學性的關注和環繞身份認同議題的當代文化政治之間，竟然驚人地相似。”^[1] 中國女性主義通過文學書寫的方式，的確為人類反思現代性提供了重要角度和不同經驗，也為世界女性主義提供了另一種政治策略。因此，“文學的女性主義”這一概念或命名，不僅指稱大中華語境不同現代性板塊存在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現象，更強調其呈現的靈活多樣的文本政治，正是多元女性主體建構所需要的多元的政治策略，使“文學的女性主義”可與自由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及其他多種女性主義一樣，擁有世界女性主義多樣性存在中值得研究和借鑒的女權政治傳統。因此，我們也是在中西對比視野中，將大中華語境的複數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命名為文學女性主義，以突出她存在的女權政治意義。她是文學形式的婦女解放運動，多元女性主體建構是其政治目標，以多元女性主體反思現代性，成為全球後現代女權主義勁旅，不僅豐富了有著悠久文明傳統的大中華語境，而且為大中華語境與西方語境平等對話提供了多元主體想像力。

1 周蕾：《世界標靶的時代：戰爭、理論與比較研究中的自我指涉》，陳衍秀譯，台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公司 2011 年版，第 115 頁。